

# “中国”的古今演绎

冯天瑜

(武汉大学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, 湖北 武汉 430072)

**[摘要]**“中国”一词,从古至今发生了深刻的内涵演变和外延拓展,这种演变与拓展正是文化的古今更革、中外交会的产物。“中国”以整词出现,较早见于周初,初义为“中央之城”,后衍生出“天下中心”等义,其语义曲折流转之间,不仅隐含着疆域推衍,而且从地理中心、政治中心派生出文化中心含义。“中国”作为非正式的国名,与异域外邦相对称,汉唐史籍已有记载;作为与外国对等的国体概念,萌发于宋代,至近代演为与世界列邦并存的民族国家之名。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展开与深入,中国学人中的见识卓异者发现,“中国”并非我国的专称,异域也有自视“中国”的。近代中国面临西东列强侵略的威胁,具有近代意义的“民族国家”意识应运而生,“中国”作为国名的简称为国人共用,并为国际社会普遍肯认。“中国”一词的使用,须全面观照其古典义和现代义及二者的因革转化。

**[关键词]**“中国”; 古典义; 现代义; 地理中心; 文化中心; 民族国家

**[中图分类号]** K203 **[文献标志码]** A **[文章编号]** 1001-4799(2012)03-0055-04

中国文化史,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及世界创造文化的历史,中国文化与外域文化的交互关系,也是题中应有之义。如果将中国文化史比喻为波澜壮阔、起伏跌宕的多幕戏剧,“中国”与外域便是演出舞台,“中华民族”是演出主体,“文化”是演出内容。我们研习中国文化史,应当了解舞台、主体和内容。“中国”、“民族”、“文化”等等关键词都出自汉语古典,然其在近现代都发生了深刻的内涵演变和外延拓展,这种演变与拓展正是文化的古今更革、中外交会的产物。诠释“中国”、“中华民族”、“文化”、“中国文化”等语,进而考辨概念史背后包蕴的历史实态的演化,是研习中国文化史的入门之径。作为中国文化演出舞台的“中国”,是一个今人耳熟能详的词语,然而,“中国”的含义却经历了曲折的流变:从古代的“城中”义到“天下中心”义,进而演为近代的与世界列邦并存的民族国家之名。

## 一、释“中”

中国之“中”,甲骨文、金文像“有旒之旆”(有飘饰的旗帜),士众围绕“中”(旗帜)以听命,故“中”又引义为空间上的中央,谓左右之间,或四方之内核;又申发为文化或政治上的枢机、轴心地带,所谓“当轴处中”,有“以己为中”的意味,与“以人为外”相对应。

## 二、释“国”

中国之“国”,繁体作“國”,殷墟甲骨文尚无此字,周初金文出现“或”及“國”字,指城邑。《说文》:“邑,國也,从口”,原指城邑。古代的城,首先是军事堡垒,口(音围)示城垣,其内的“戈”为兵器,表示武装,含武装保卫的天子之都之义,以及诸侯辖区、城中、郊内等义。

综论之,“中”指居中集众之旗,引申为中心、中央;“国”指执戈捍卫之城,进而指称军事、政治中心地。

## 三、释“中国”

由“中”与“国”组成“中国”,以整词出现,较早见于周初,如青铜器《何尊》铭辞记周武王克商,廷告上天曰:“余其宅兹中国,自之辟民。”最早的传世文献《尚书·周书·梓材》追述周成王说:“皇天既付中国民,越厥疆土,于先王。”《诗经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孟子》等先秦典籍也多用此词。

**[收稿日期]** 2012-03-15

**[基金项目]**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资助项目:07JZD0040

**[作者简介]** 冯天瑜(1942-),男,湖北红安人,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资深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主要从事中国文化史、湖北地方史研究。

“中国”初义是“中央之城”，即周天子所居京师(首都)，与“四方”对称，如《诗经·大雅·民劳》云：

民亦劳止，迄可小康，惠此中国，以绥四方。

毛传释曰：“中国，京师也。”

《孟子·万章》讲到舜深得民心、天意，“夫然后之中国，践天子位。”这些用例的“中国”，均指居天下之中的都城，即京师，诚如刘熙为《孟子》作注所说：

帝王所都为中，故曰中国。

初义京师的“中国”又有多种引申：

(一)指诸夏列邦，即黄河中下游这一文明早慧、国家早成的中原地带，居“四夷”之中，《诗·小雅·六月》序：“四夷交侵，中国微矣。”西周时，“中国”主要包括宋、卫、晋、齐等中原诸侯国，此义的“中国”后来在地域上不断有所拓展。

(二)指国境之内。《诗·大雅》：“文王曰咨，咨女殷商，女奭桀于中国，斂怨以为德。”《谷梁传·昭公三十年》注：“‘中国’，犹国中也。”

(三)指中等之国。《管子》按大小排列，将国家分为王国、敌国、中国、小国。

(四)指中央之国。《列子》按方位排列，将国家分为南国、北国、中国。

以上多种含义之“中国”，使用频率最高的，是与“四夷”对称的诸夏义的“中国”，如《诗经·小雅·六月》序云：

《小雅》尽度，则四夷交侵，中国微矣。

南朝宋刘庆义《世说新语·言语》说：“江左地促，不如中国。”唐人韩愈《上佛骨表》云：

夫佛者，夷狄之一法耳，自后汉时传入中国，上古未尝有也。

这些“中国”，皆指四夷万邦环绕的中原核心地带。其近义词则有“中土”、“中原”、“中州”、“中夏”、“中华”等等。

#### 四、中国疆域推行

中华先民心目中的世界，形态为“天圆地方”，所谓“中国”，是以王城(或称王畿)为核心，以《国语·周语》所谓“五服”(甸、侯、宾、要、荒)或《周礼·夏官·职方氏》所谓“九服”(侯、男、甸、采、卫、蛮、夷、镇、藩)为外缘的方形领域，作“回”字状向外逐层延展，中心明确而边缘模糊，在西周及春秋早期，约含黄河中下游及淮河流域，秦、楚、吴、越等尚不在其内，但这些原称“蛮夷”的边裔诸侯强大起来，便要“问鼎中原”，试图主宰“中国”事务。至战国晚期，七国都纳入“中国”范围，《荀子》、《战国策》诸书所论“中国”，已包含秦、楚、吴、越等地。

秦一统天下后，“中国”范围更扩展至长城以南、临洮(今甘肃)以东的广大区间，周秦之际成篇的《尚书·禹贡》言及中国的“四至”：

东渐于海，西被于流沙，朔南暨声教，訖于四海。

《汉书·西域传》说：“及秦始皇攘却戎狄，筑长城界中国，然西不过临洮。”汉唐以降，“中国”的涵盖范围在空间上又有所伸缩，诸正史多有描述。

秦汉帝国建立后，“中国”疆域放大，包括东南至于海、西北达于流沙的朝廷管辖的广阔区间。历代中国王朝版图多有伸缩，清乾隆二十四年(1759)大体奠定中国疆域范围：北起萨彦岭，南至南海诸岛，西起帕米尔高原，东极库页岛，约1260万平方公里。19世纪中叶以后，西东列强攫取中国大片领土，由于中国人民的英勇抵抗，使领土避免更大损失。今日中国面积960万平方公里，仅次于俄罗斯、加拿大，居世界第三位。

#### 五、地理中心—政治中心—文化中心

“中国”原指华夏族活动的地理中心与政治中心，自晚周以降，“中国”一词还从地理中心、政治中心派生出文化中心含义。《史记》卷43《赵世家》所载战国赵公子成的论述颇有代表性：

中国者，盖聪明徇智之所居也，万物财用之所聚也，贤圣之所教也，仁义之所施也，诗书礼乐之所用也，异敏技能之所试也，远方之所观赴也，蛮夷之所义行也。

与叔父公子成论战的赵武灵王(?—前295)则指出，夷狄也拥有可资学习的文化长处，如“胡服骑

射”便于作战,中原人应当借取,从而壮大“中国”的文化力。发生在赵国王室的这场辩论,给“中国”的含义赋予了文化中心的内蕴。

古人还意识到文化中心是可以转移的,故“中国”与“夷狄”往往发生互换,唐韩愈《原道》所谓“诸侯用夷礼则夷之,进于中国则中国之”。明清之际哲人王夫之(1619—1692)在《读通鉴论》、《思问录》等著作中,对“中国”与“夷狄”之间文野地位的更替,作过深刻论述,用唐以来先进的中原渐趋衰落,蛮荒的南方迎头赶上的事实,证明华夷可以变易,“中国”地位的取得与保有,并非天造地设,而是依文化先进区不断流变而有所迁衍,诚如《思问录·外篇》所说:“天地之气,衰旺彼此迭相易也。”

## 六、“中国”衍为国名

我国古代多以朝代作国名(如汉代称“汉”、“大汉”,唐代称“唐国”、“大唐”,清代称“清国”、“大清”),外人也往往以我国历史上强盛的王朝(如秦、汉、唐)或当时的王朝相称,如日本长期称中国人为“秦人”,称中国为“汉土”、“唐土”,江户时称中国人为“明人”、“清人”。此外,印度称中国为“支那”,意谓“文物之国”;希腊、罗马称中国为“赛里丝”,意谓“丝国”。

以“中国”为非正式的国名,与异域外邦相对称,首见于《史记·大宛传》,该记载汉武帝(前156—前87)派张骞(?—前114)出使西域:

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、安息之属,皆大国,多奇物、土著,颇与中国同业,……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间使,四道并出。

这种以“中国”为世界诸国中并列一员的用法,汉唐间还有例证,如《后汉书·西域传》以“中国”与“天竺”(印度)并称;《唐会要·大秦寺》以“中国”与“波斯”、“大秦”(罗马)并称。但这种用例以后并不多见。

一个朝代自称“中国”,始于元朝。《元史》卷95《列传·外夷一》载,元世祖忽必烈(1215—1294)派往日本的使臣所持国书,称自国为“中国”,将日本、高丽、安南、缅甸等邻邦列名“外夷”。明清沿袭此种“内中外夷”的华夷世界观,有时也在这一意义上使用“中国”一词,但仍未以之作为正式国名。

“中国”作为与外国对等的国体概念,萌发于宋代。北宋不同于汉唐的是,汉唐时中原王朝与周边维持着宗主对藩属的册封关系和贡赋关系,中原王朝并未以对等观念处理周边问题;赵宋则不然,北疆出现了与之对峙的契丹及党项羌族建立的王朝——辽与西夏,这已是两个典章制度完备、自创文字,并且称帝的国家,又与赵宋长期处于战争状态,宋朝还一再吃败仗,以致每岁纳币,只得放下天朝上国的架子,以对等的国与国关系处理与辽及西夏事务,故宋人所用“中国”一词,便具有较清晰的国体意味。在这种历史条件下,北宋理学家石介(1005—1045)著《中国论》,此为首次出现的以“中国”作题的文章,该文称:

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,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。

这已经有了国家疆界的分野,没有继续陶醉于“溥天之下,莫非王土”的虚幻情景之中,此后,“中国”便逐渐从文化主义的词语,变为接近国体意义的词语。当然,国体意义上的“中国”概念,是在与近代欧洲国家建立条约关系时正式出现的。

欧洲自17世纪开始形成“民族国家”(nation-state),并以其为单位建立近代意义上的国际秩序。清政府虽然对此并无自觉认识,却因在客观上与这种全然不同于周边藩属的西方民族国家打交道,因而需要以一正式国名与之相对,“中国”便为首选。这种国际关系最先发生在清—俄之间。俄国沙皇彼得一世(1676—1721)遣哥萨克铁骑东扩,在黑龙江上游与康熙皇帝(1654—1722)时的清朝遭遇,争战后双方于1689年签订《尼布楚条约》,条约开首以满文书写清朝使臣职衔,译成汉文是“中国大皇帝钦差分界大臣领侍卫大臣议政大臣索额图”,与后文的“斡罗斯(即俄罗斯)御前大臣戈洛文”相对应。康熙朝敕修《平定罗刹方略界碑文》,言及边界,有“将流入黑龙江之额尔古纳河为界:河之南岸属于中国,河之北岸属于鄂罗斯”等语,“中国”是与“鄂罗斯”(俄罗斯)相对应的国名。

如果说,17世纪末叶与俄罗斯建立条约关系还是个个别事例,此后清政府仍在“华夷秩序”框架内处理外务,那么,至19世纪中叶,西方殖民主义列强打开清朝封闭的国门,古典的“华夷秩序”被近代的“世界国家秩序”所取代,“中国”愈益普遍地作为与外国对等的国名使用,其“居四夷之中”的含义逐渐淡化。

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,中英两国来往照会公文,言及中方,有“大清”、“中华”、“中国”等多种提法,而“中国”用例较多,如林则徐(1785—1850)《拟谕英吉利国王檄》说:

中国所行于外国者,无一非利人之物。

以“中国”与“外国”对举。与英方谈判的清朝全权大臣伊里布(1772—1843)《致英帅书》,称自国为“中国”,与“大英”、“贵国”对应,文中有“贵国所愿者通商,中国所愿者收税”之类句式;英国钦奉全权公使璞鼎查(1789—1856)发布的告示中,将“极东之中国”与“自极西边来”的“英吉利国”相对应,文中多次出现“中国皇帝”、“中国官宪”、“中国大臣”<sup>[1] 445,450</sup>等名目。而汉文“中国”正式写进外交文书,首见于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(1842年8月29日)签署的中英《江宁条约》(通称《南京条约》),该条约既有“大清”与“大英”的对称,又有“中国”与“英国”的对称,并多次出现“中国官方”、“中国商人”的提法。此后清朝多以“中国”名义与外国签订条约,如中美《望厦条约》以“中国”对应“合众国”,以“中国民人”对应“合众国民人”<sup>[2] 30-33</sup>。

### 七、“中国”并非我国专称

古代中原人常在“居天下之中”意义上称自国为“中国”,但也有见识卓异者发现,“中国”并非我国的专称,异域也有自视“中国”的。

曾西行印度的东晋高僧法显(约342—约423)《佛国记》中说,印度人以为恒河中游一带居于大地中央,称之为“中国”。

明末来华的耶稣会士利玛窦(1552—1610)、艾儒略(1582—1649)等带来世界地图和五洲四洋观念,改变了部分士人的中央意识。如瞿式耜《职方外纪小言》云:“按图而论,中国居亚细亚十之一,亚细亚又居天下五之一,……戈戈持此一方,胥天下而尽斥为蛮貉,得无纷井底蛙之诮乎。”

清人魏源(1794—1857)接触到更翔实的世界地理知识,认识到列邦皆有各自的“中国”观。《海国图志》卷74有云:

释氏皆以印度为中国,他方为边地。……天主教则以如德亚为中国,而回教以天方国为中国。

近代学人皮嘉佑《醒世歌》一文道:“若把地球来参详,地球本是浑圆物,谁是中央谁四旁?”这都是对传统的“中国者,天下之中也”观念的理性反思与修正。

近代中国面临西东列强侵略的威胁,经济及社会生活又日益纳入世界统一市场,那种在封闭环境中形成的虚骄的“中国者,天下之中”观念已日显其弊,具有近代意义的“民族国家”意识应运而生,以争取平等的国家关系和公正的国际秩序。而一个国家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,拥有一个恰当的国名至关重要,“中国”作为流传久远、妇孺尽知的简练称号,当然被朝野所袭用。梁启超(1873—1929)、汪康年(1860—1911)等力主,应当扬弃“中国者,天下之中也”的妄见,但“中国”这个自古相沿的名称可以继续使用,以遵从传统习惯,激发国民精神。他们指出,以约定俗成的专词作国名,是世界通则,西洋、东洋皆不乏其例<sup>①</sup>。而近代兴起的反殖民主义、反帝国主义运动,更赋予“中国”以爱国主义内涵。1903年4月《湖北学生界》所载《论中国之前途及国民应尽之责任》一文所言“中国者,中国人之中国,非外人所得而干涉也”,便是在近代民族国家意义上呼唤“中国”,这已经成为国民共识。如果说,“大清”和“中国”在清末曾并列国名,交替使用,那么,辛亥革命以后,“中国”先后作为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,以正式国名被国人共用,并为国际社会普遍肯认。

今人当在全面观照“中国”的古典义和现代义及二者的因革转化的基础上,使用“中国”一词。“中国文化史”正是在作为历史范畴的“中国”这一逐步扩展的空间,得以生发、演绎的。

### [参考文献]

- [1] 中国史学会.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:鸦片战争[M].上海:神州国光社,1954.  
[2] 王铁崖.中外旧约章汇编:第1册[M].北京:三联书店,1957.

[责任编辑:邓建华]

<sup>①</sup>见梁启超《饮冰室文集》卷6,第3页。汪康年《汪穉卿先生遗文》第13页:“吾国古来自称中国,对于四夷言之也。……盖名称之源于古者,或不免有所错误,而承袭既久,安能革之。即西人之各种名称,似此者多矣。安能一一革之乎。又如日本二字,今日核之于理,岂有当乎。”